

营生之路：中国山东铜瓷的生存语境及存在价值

Make a Living. Technical Talent and Folk Cultur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Kanci in Shandong Province

黄娜娜*
(HUANG NaNa)

摘要

从山东铜瓷的生存语境和存在价值两个维度出发，阐述了山东铜瓷作为养家糊口的营生后的生存背景和生存语境。通过对山东铜瓷的历史存续的梳理，探析了山东铜瓷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通过对山东铜瓷的艺术特征的解读，可以看出山东铜瓷重视铜器的实用性，这与山东地区社会经济环境、人民群众勤俭朴素的生活观念关系密切。而山东铜瓷的传承与发展也反映了山东地区受孔孟思想的影响，思想较为保守，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开放性的思维也在逐渐深入至山东地区。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商业经济价值等方面阐述了山东铜瓷的存在价值。山东铜瓷之所以存续并发展着，它不仅仅是承担修复功能的技艺，它所体现的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承，是一种社会时代进步的记录，是人们生活追求的承载，是文化创新型转化，实现经济文化融汇发展的表达。

关键词：山东铜瓷、生存语境、存在价值

Abstract

From the survival context and existence value of the Shandong porcelain, its survival and context as a livelihood are explained. By combing the historical survival of the Shandong porcelai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re explore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ndong porcelain, it can be seen that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ality of porcelai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Shandong and the people's frugality and simple lif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ndong porcelain also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thoughts in Shandong. The thoughts are more conservative.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open thinking is gradually deepening in Shandong. From the cultural value, educational value, artistic aesthetic value, commercial economic value, and other aspects, the value of existence of the Shandong porcelain is expounded. The reason why the Shandong porcelain survives and develops is not only the restoration skill, but also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which is a record of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al era, the

* 黄娜娜博士 潍坊理工学院副教授、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研究博士。电邮地址：345897147@qq.com

carrier of the people's pursuit of lif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y and culture.

Keywords: Shandong porcelain, survival context, existence value

前言

中国山东铜瓷的始与兴，乃至后期的没落与再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从山东铜瓷的历史存续、艺术特征、传播传承为切入点，分析山东铜瓷的生存语境和存在价值，由此探究山东铜瓷最初的营生之路。

一、解读中国山东铜瓷的生存语境

中国的陶瓷制造历史长远，依据目前的历史资料来看，在夏文化或者夏商期的二里头文化（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前十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高温施釉炆器。随着陶瓷制造的发展以及其不堪撞击易碎的宿命，陶瓷修复技术应运而生，也由此成为了一个行业。笔者从历史存续、艺术特征、传承特点来解读山东铜瓷的生存背景。

（一）山东铜瓷的历史存续

陶瓷器物自唐宋之后在民间传播开来，虽然已经获得了广泛地使用，但由于其烧制的不易，人们对其是倍加珍惜，当时的百姓对于家中的食具、茶具等是十分珍惜的，出现裂璺后通常不会丢弃，而是会选择铜瓷匠人对其修复，对于具有纪念性的器物更是会选择这种方式。铜瓷技艺在经过实践、归纳后被铜瓷匠人总结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复模式，即铜瓷行当，破碎的陶瓷器物因此获得了新生，同时，铜瓷手艺也作为一门朴实的营生代代传承了下来。

依据现有可查的铜瓷修复标本，目前可追溯到唐代，即甘肃武威唐弘化公主墓出土的白釉带流壶。资料记载，弘化公主为太宗女，于贞观十七年（643）嫁给青海国王勤豆可汗慕容诺曷钵，圣历元年（698）寝疾于灵州私第，并在圣历二年（699）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弘化公主的墓曾被盗掘，遗存的白釉带流壶壶身有一道裂痕，其裂痕两侧就施以铜钉加固来防止裂纹持续扩大，虽然部分铜钉已经脱落，但从白釉带流壶中仍然能清晰地看到铜钉两只一组等距分布排列的痕迹，另外从铜钉脱落的部分可以看到铜孔细小，且属于不穿透的钻孔。根据各方面考证，基本可以确定弘化公主墓出土的该器物是目前中国已知的最早的铜瓷标本，且有较大的可能是出自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地区的“铜瓷工作坊”。此外，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出土的十二世纪后期的定窑白瓷花口碗，以及在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出土的定窑白瓷大钵，器物身上也有铜孔和残存的铜钉，这些均可以视为铜瓷标本。但从这两件铜瓷标本中我们可以得出，当时的瓷器修复中有高温施釉的细瓷或炆器，也有施釉的实用粗器，这也证实了当时相对应地域内或许存在做铜瓷营生的匠人这一种说法。

根据铜瓷可考证的相关资料，明清时期作为中国陶瓷发展的顶峰时期，伴随陶瓷制造发展而产生的陶瓷修复技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也是形成了一种职业。自明代以来，铜瓷修复是民间通用的兼具实用性和牢固性的修缮方式。明代后期，铜瓷不仅在市井行当中成为了一种职业，铜瓷的场景或铜补的痕迹也在当时成为了文人圈里用来表达象征古物的道具，以及营造高古气氛的方式。此前引述的王问《煮茶图》，就是文人借由铜补后的器物来寓意高古的创作形式，文人之所以如此创作，则是选取了古时铜瓷实用性这一特点。他们善于沿用这类创作手法，将这点作为民间生活的写照，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南宋刘松年（约1150-1225以后）《蚕事图》在送柴入灶的妇人后方绘制带盖子且用铜钉修补过的缸瓮。该画作描绘的本就是生活场景，铜钉修补的缸瓮成为了朴实生活的写实点缀，也更加证实了铜瓷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技术。这种象征古物的修饰表达方式不仅出现在文人画作中，也出现在了其他材质的手工艺品种，如木雕作品“富贵吉祥”。另外，明清时期的京剧剧目《铜大缸》（又名《补大缸》）、民间小调《王大娘铜缸》中也描述了与铜瓷相关的情景，从这些剧目名称中可以推断剧目中所说的铜大缸就是铜钉修补缸瓮，应是民间较为流行的铜瓷形式。根据相关史料推断，清代的铜瓷技艺也是较为常用的，但是相比明代对于铜瓷的理念认知，清代在修复时会因陶瓷器物的不同属性和应用而选择不同的修补方式，从《造办处活计档》的记事来看，由乾隆皇帝下令修补的陶瓷作品几乎全属前代名窑古瓷，并以他偏爱的宋代官窑青瓷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未见以铜瓷修补宋瓷的记事，这一现象似乎也是反映了乾隆皇帝对于瓷器修复的认知理念，他应该是崇尚将瓷器修复至外观完美无瑕，且在修复美观的同时尽量保持器物原本的风貌特点，因此铜瓷修复的方式于此类修复理念面前就显得不适用。但这仅是对皇家御用或收藏瓷器而言，在民间的生活中铜瓷修补仍然是被视为最为实用且牢固的修补方式，也是最为常见的修补方式。

目前中国铜瓷技艺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叫王振海，艺名王老邪，祖籍山东，泰山元极门第37代传人。他的祖父曾是清宫造办处铜瓷御工，慈禧的御用匠人，人称山东巧工王神手。他们世袭康熙御赐斋号“乌龙堂”。这一点印证了山东铜瓷在清末民初时期的鼎盛发展状况，同时也说明了山东铜瓷在当时就已经有了服务官民之区别，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因铜瓷修补的目的和服务对象的不同而产生的“粗活”和“细活”。因服务对象为官家贵族，御用工匠的手艺被称之为“细活”，也叫“铜活秀”。相反，为民服务的工匠营生手艺被称之为“粗活”。

民国、新中国刚成立时期，铜瓷穿梭在山东地区的大街小巷，在老百姓生活中铜瓷艺人是万能修补匠。不管是人口稠密的市镇街头巷尾，还是乡间村落的门前屋后，都能听到铜瓷艺人的“晃荡”声和“吆喝”声，寻到他们背着扁担工具箱的身影。旧时的铜瓷艺人靠走街串巷招揽生意，他们所有的工具都在肩上挑的扁担中，扁担的两头儿是两个木柜，一个木柜中有多个抽屉，铜瓷艺人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等都装在其中，另一个木柜中装着炉子、风箱等专门负责加热处理材料的。在扁担的一头还挂着一个带锤的铜锣，也有的是悬挂着类似拨浪鼓的货郎叫卖工具，走街串巷的过程中要吆喝“铜盆、铜碗、铜大缸嘞”等招揽生意广告语，后来是铜锣或拨浪鼓配合广告语

的吆喝声，又慢慢演化为以敲击铜锣或拨浪鼓代替了吆喝声，成为了代表该行当招揽生意的标志。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工业化的发展让曾经稀缺的陶瓷产品逐渐走上了富足供应，量大且种类多的陶瓷产品涌入到消费市场，曾经活跃在人们生活中的铜瓷行当的传统生存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也随着人们生活条件、方式、理念的改变，这一行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几近消失于人们的生活视野中。再次被人们寻回，其生存环境或者铜瓷技艺的身份已经发生了些许转变，当下的铜瓷艺人几乎不再有走街串巷、肩挑扁担的形象了，如今这类形象已慢慢成为了一种宣传活动行为。现在铜瓷艺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走街串巷的当街做活已经渐渐被固定的工作室取代，收纳工具的扁担也被相对固定的工作台所取代。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铜锣、拨浪鼓等宣传工具以及广告吆喝声，也逐渐被网络平台、电视、报刊、自媒体所取代了。甚至随着科技的发达，还出现了铜瓷机器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与相关工作开始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也正是这样的机遇，铜瓷技艺以及铜瓷艺人都迎来了一个新的身份认证，环境、身份虽出现了变化，但他们的发展也是传承与发扬的一种体现。目前山东铜瓷作为非遗项目在山东地区有省级、市级、县区级传承人。各地对于铜瓷技艺的支持及推广虽略有不同，但是新的环境与身份确实赋予了铜瓷重新发展的机遇。

山东地区作为中国铜瓷的三大起源地（山东、河北、河南）之一，其清末民初是山东铜瓷发展的兴盛时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几近消失，自二十世纪末铜瓷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山东地区是保留有关于“铜瓷”的民间传说比较多的地域之一，在山东地区内，潍坊、青岛、聊城等地也是保存及发展较好的地域。根据山东地区的经济文化特色，前面所引述的案例《铜大缸》中的铜缸，也正是山东地区民间最常见的实用器物修补方式之一。山东地区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旧时的人们以田地劳作为主要工作，百姓的生活也是艰苦朴素的，家中的吃饭用的食器，喝水用的茶器亦或是盛水用的缸瓮容器，都是被百姓视为比较珍贵的家具用品，因此，倘若出现了破损，首先就会选择铜瓷这种最实用且牢固的修补方式。

（二）山东铜瓷的艺术特征

山东铜瓷反映了山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体现了山东人民的思想、理念、艺术审美等。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强调实用与审美相结合：铜瓷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它对于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审美观念的反应是极为自然的，在它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的参与和支持是自发性的。正是由于这种自发性，使得铜瓷的实用性高于审美性。山东铜瓷是为满足劳动人民对器物的实用要求而服务的造物活动。在山东地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劳动人民追求朴素、简单的生活，随着政治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理念、消费及审美的变化，使得铜瓷使用者从单纯的追求实用性，向追求审美转变，但这种追求审美仍然是基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此时的实用则在审美的作用下分为了使用与观赏。

第二、体现了山东工匠精神：山东铜瓷在发展中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变迁，铜瓷艺人在当时被视为是“万能匠”，他们不仅会铜瓷，还会许多其他的手艺，如铁匠、木匠、锡匠的活儿，铜瓷艺人也多半会做。他们讲究变通且爱学习，用“技多不压身”来形容他们是最贴切的。同时，他们在做自己的铜活儿时有许多讲究：一要态度端正，认真对待每一位顾客，认真修复每一件器物；二是做活儿讲究精、细、准，每一次修复都要精细耐心，同时要准确的为器物本身思考设计，为每一位顾客的愿望清单，耐心揣摩；三是不怕比较、不厌学习，不妄自评价同行作品，也不过分张扬自身技艺，不怕比较，可以直面自身技艺的问题，可以虚心请教，不断学习；四是修器先修心，手工艺的路都是枯燥的，要先培养自身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明确自己的追求，耐住寂寞，潜心练习，吃苦耐劳。

第三、承载着传统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山东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在生产之初，就是以传统的农耕渔猎经济为主，在这一时期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山东铜瓷是一个伴随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的行当，它作为民间艺术，起初就是传统生产经济补充，在它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生产者和服务对象都是劳动人民，这使得它在工艺选材上，会尽可能选耐用且节省成本的材料，即使是后来各种材料随着工业的发展进入到市场，铜瓷艺人也会选择相对耐用的、环保的材料。在造型装饰上会尽量做到简洁、朴素，不形成过度加工的痕迹，即使需要加工装饰，也会根据器物自身的特点以及器物破损的具体情况从简设计。因铜瓷技艺所用的工具及材料，都对自然环境有较高的依赖，故而，在选材和制作的过程中，铜瓷艺人都会用心揣摩，让所用材料都发挥其最大的功用，并且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秉持不浪费资源，制作过程中，材料使用后的边角料都会细心收好，再利用，这都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山东铜瓷作为一门修复技艺，所面对的器物以破损实用瓷器为主，它的产生除了因社会发展中的物资匮乏，而产生的“惜物”观念，还主要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节约”。山东铜瓷的使用者（广大民众）选择修复的初心都是一样的，即尽可能的延长器物的使用时间。关于使用者修复的初心，集中于器物本身的价值和器物对使用者而言的价值。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器物也许本身价值不高，但对于当时的使用者而言，它的价值是高的，是值得花钱修复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工业技术进步，铜瓷使用者因器物自身价值高而选择修复的情况增多。不管何时，使用者选择修复的时候，都存在不计器物本身物质价值，仅仅因器物对使用者有情感价值而修复的情况。

第四、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第一，从全国视角出发，在传统社会里，山东铜瓷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以山东地区为主，那个时期主要是受经济社会发展、交通环境的影响，铜瓷艺人的生活地域范围即其技艺的服务地域范围，这样相对封闭的人文社会环境，让当时的山东铜瓷对此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如前所述，山东地区的自然、人文、经济都有自身浓厚的特点，加之生产和流通的相对封闭，反而促成了山东铜瓷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色彩，山东也被称为中国三大铜瓷地区之一；第二，从山东视角出发，山东铜瓷艺人分布是较为均匀的，从山东整体地理位置来看，东、西、南、北、中等地区都有铜瓷艺人的分布，这也说明了山东铜瓷起源早，此前

从事这个行当的艺人还是较多的。山东独特的半岛地理环境因素,使得山东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文化差异还是较为显著的,因此,山东不同地区的铜瓷,也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三) 山东铜瓷的传承与传播

山东铜瓷的传播与传承在民国之前的铜瓷历史多数难以考证,田野调查中通过对多位艺人口述内容的归纳发现,关于山东铜瓷的传承与传播发展在近代比较清晰,民国、新中国刚成立那段时期,铜瓷艺人在山东地区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万能修补匠,在人口稠密的市镇、乡村走街串巷,也一度是街头巷尾最为活跃的行当之一,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国内工业化的发展使得陶瓷产量大幅提升,并且涌入到消费市场,再加上特殊历史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曾经四处走街串巷的铜瓷行当由于其传统生存环境的消亡以及自身与人们生活方式的脱离,逐渐不再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得到重视,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社会价值开始备受关注。

山东铜瓷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个体经营或家庭作坊,技艺的传承也都是依靠子承父业或师徒相授这类较单一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公私合营以及新中国文化事业建设的需要,铜瓷艺人开始分化为两类,一类仍旧是个体经营,但经营范围已经从老百姓的生活向外拓展到文玩行列;另一类则脱离古董行和百姓日常铜活儿,进入了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工作,技艺不再是个人或家庭私有的秘技,而是通过单位内部师徒制进行传播,传承生态产生非常大的转变。改革开放后,技艺传承出现多种形式并存的情况,包括馆内带徒、在职培训、院校教育、社会培训等。

经过调研汇总,目前山东铜瓷的传承模式有师徒相传、家族传承、社会培训、院校教育四大类。其中以师徒相传为主,子承父业的家族传承模式已为极少数存在,不过在家族传承模式中已摆脱了旧时传男不传女的陈规旧俗,女性传承者开始出现。铜瓷行当的社会培训从2004年起也开始,在山东地区普遍存在是从2010年起,它成为铜瓷技艺的重要传播传承模式,许多铜瓷艺人都开设了手工坊或者工作室,如山东威海的铜瓷技艺省级传承人耿海胜,他可以算是山东地区第一位做社会培训的,他探索学员制培训模式,并且成立了铜瓷文化有限公司,专门从事相关培训工作。院校教育对文化艺术传承的有不可替代的传播作用,无疑是许多手工技艺传承的路径,但院校教育对于教育内容有一定的要求,铜瓷是一门技术性要求较高的手工技艺,对制作的工具要求较多,同时工艺操作上的难度较大,因此,在院校教育这一模式中,主要是以技艺传播为主,技艺传承其实并未得到有效的开展。不过在调研中也发现,不乏许多铜瓷的传承者,是从在校的技艺传播中对铜瓷技艺产生了兴趣,从而开启了传承之路,他们由于对铜瓷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了解,后又对该技艺进行了深入学习,因此,相对民间的纯技艺传承者而言,笔者姑且将他们称之为“学院派”。

二、中国山东铜瓷的存在价值

中国山东铜瓷之所以存续并发展着，是其多种存在价值的共同作用，本文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商业经济价值四方面进行阐述。

（一）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灵魂，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家发展的根基。文化的认同与传承，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总结出的经验。民间艺术作为地区重要的民间文化资源，是传承地区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血脉，也是人民大众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二字明确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传承主体是广大劳动人民，也指明了民间艺术的生存发展空间。这里的艺术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更具备了文化内涵，是能够代表人民大众生活意义的文化符号。中国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开始重视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等相关研究。

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在巴黎通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或译《关于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的建议》），其中的“民间创作”定义为：“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这里对于民间创作的定义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雏形，其内容与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基本一致。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中国来说，是属于舶来文化概念，在它传入中国之前，国内存在着“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民间传统文化”等概念，这些概念所强调的“民间”“民俗”“传统”等性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强调的非常相似，并且还有许多是属于重合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了生态性、活态性、传承性、地域性、变异性等特征，现在在文化的范畴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山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丰富的非遗资源。自文化部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山东地区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8个，国家级名录186项，省级名录1073项，市级名录4121项，县级名录12758项，总量居全国第三。

铜瓷技艺，2014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古陶瓷修复技艺中，山东铜瓷作为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传统技艺。在文化价值中它有四价值体现，分别是文化现实、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创新。首先是文化现实价值，关于传统工艺，柳宗悦将工艺细分成了手工工艺和机械工艺，又将手工工艺再次细化为了贵族工艺、个人工艺、民众工艺。而根据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及文化发展背景，传统工艺及其文化可以分为民间工艺、宫廷、文人、少数民族工艺文化四部分。而山东铜瓷则可以归纳为民间工艺文化的范畴，它是民众为满足生活需要和审美需求而产生的手工技艺，它的产生、发展、传承都是对民众日常生产生活、思想意识、艺术审美观念的反

映，它伴随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也服务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技艺，它是民众生产与生活技能的有效融合，这也就更加确定了该工艺的实用性即使用价值，这也是山东铜瓷现实价值的重要表现。

其次是文化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深深蕴藏着所属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这些维系民族血脉的元素反过来又世代塑造并延续了这些民族一脉相承的基本相同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传承。山东铜瓷起初作为一种瓷器修补技术而存在，后来在名门贵族中形成了“铜活儿秀”，从一种为普通民众生活服务的修补技术，成为文人名士追求技与艺相结合的审美追求，这其中蕴含着民族文化的认同。山东铜瓷发展的起落，不仅仅是单纯的市场需求的变化，它之所以进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下民众对于山东铜瓷的文化记忆与认同，它承载了民众对于铜瓷文化产生的情感与审美的升华，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中，这种升华让当下的民众与历史中的先辈们在精神上寻到了连接点，成为民族文化的“血脉相连”。这也正是许多研究学者所认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普遍的文化认同和基因传承，代表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人类另一种伟大的精神创造，其内容、内涵比起物质类遗产更为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

再次是文化传承，山东铜瓷作为传统技艺，具备了独特的艺术特征文化，它是通过代代相传延续下来的，尽管在传承方式上历经了变迁，有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现代学徒传承、学校教育传承、机构传承等多种模式，但正是由于有这些传承，才促进了这项技艺的更新发展，也促进了后人的传承学习和文化创新。山东铜瓷在传承中，充分展现了过去民众的生产、生活的社会历史缩影，我们可以从这些变迁和传承中了解到过去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民众的社会习俗文化礼仪等，吸取他们的生产生活经验与智慧，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展价值所在。

最后是文化创新，在民间有许多与铜瓷艺人相关的文艺作品，如戏剧、小说、绘画、歌曲以及歇后语等，可见铜瓷与民间文化艺术是关系密切的。在戏剧中，有《王大娘补缸》，这部作品通过对铜瓷工匠形象的塑造，描绘了铜瓷的场景；在歇后语文化中，有许多歇后语是通过铜瓷的工艺、铜瓷艺人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如“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意思是铜瓷做活儿，必须有金刚钻，否则无法开展相关技术，言外之意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做事情要靠真实的能力，假大空是不可存在的；“小炉匠的挑子，一头热”，它是旧时铜瓷从业者常规形象的描述，旧时从事铜瓷行当的人有许多别称，如“铜匠”“镔炉匠”“小炉匠”等，他们外出干活时总是挑着担子，担子的两头配置不同，一头是可以加热的炉子，一头是装满工具、材料的箱子，这整体的想象就如歇后语所描述的那般，后来被用来暗指对待同一件事情，双方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观念，一方愿意，一方不愿意，与一厢情愿意思相近。

（二）教育价值

山东铜瓷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产物，它包含了铜瓷艺人的劳动、创造力以及精神意志。它的教育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前进的，主要有社会记忆和科技教育两点。

关于社会记忆，其最早的概念是源自于集体记忆，但它与集体记忆又存在明显的区别。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指出社会记忆是可以被构建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也指出记忆能被传播才有意义，社会记忆的传播形式是记忆仪式和身体实践。山东铜瓷在发展演变中，凸显了社会历史的变迁，同时它也代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形成了民众的社会记忆，而山东铜瓷是在程式化学习与实践中得以保护和传承的。在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山东铜瓷反映了资源匮乏时期节俭朴素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民众生活轨迹、习俗的捕捉。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地域性的，因此山东铜瓷面对全国形成了山东地区特色文化，而面对山东地区内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又孕育出了内陆特色、沿海特色，甚至是潍坊特色、威海特色、青岛特色等。

关于科技教育，山东铜瓷作为代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在技术层面具备完整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术体系，完整的传统工艺体系就蕴含了完整的科技发展历程。具体而言就是山东铜瓷具备了科学价值、技术价值、教育价值。科学价值主要是铜瓷艺人的“匠人精神”及理论知识，虽然许多铜瓷老艺人的学历都不高，但他们也是在社会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有丰富的学习经验，“匠人精神”在这里不仅仅是指的匠人的品质、品行、敬业等，还有匠人身份功能的多元化，即匠人不光是造物，还要发明创造和知识补充学习，“匠人精神”体现了匠人自身的价值理念、审美观念及道德修养，这构成了山东铜瓷技艺的文化基因；技术价值则是指的山东铜瓷的工艺流程及制作方法，技术与科学是紧密相连的，铜瓷艺人也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技能与工艺流程，从而使得技术得以进步。铜瓷技术本身就存在延续性、经验化和程式化的流程模式，尤其是在学校教育传承中，这种流程模式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制度化的学习，这推动了铜瓷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教育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传统技艺的普及，山东铜瓷作为陶瓷修复技艺，与陶瓷专业、瓷器修复专业等都是有关联的，它作为中国古代造物艺术的体现，在技艺的整个过程中锻炼了人的观察、记忆、联想与思考、动手实践的能力。铜瓷艺人将铜瓷技艺积累了千年的经验、精湛的技艺及内容形式以实践展示于世人面前，无形之中就起到文化的普及教育功能。同时，教育也是铜瓷技艺保护与传承的重要途径。

（三）审美价值

山东铜瓷从技术层面实现了民众在实际生活中的修补需求，从艺术角度体现了艺人及民众在生活中的美好愿景及人生价值的感悟。从古到今，人们都是向美而行。山东铜瓷在对“美”的追求中，诠释了“艺术来源于生活”。

就审美方式而言，它是融入性的审美。以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美学家认为，审美经验的发生有赖于一种主客分离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静观性审美关系，这种审美经验可以简称为分离式审美经验。山东铜瓷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下产生的艺术，是与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其特定的审美环境与方式，就决定了它是一种融入性审美。在其审美过程中，不需要刻意区分主体与对象，也无法单独分离出来去体验。

山东铜瓷的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是并行存在的，实用性是山东铜瓷艺人及市场需求的首要体现，因此，纹饰设计灵感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铜瓷艺人的日常生活。例如，源自于民俗信仰的神话故事传说题材、宗教信仰的佛教元素等等。其中富有吉祥寓意的纹饰图案是山东铜瓷艺人最常选择的素材，这些纹饰中融入了铜瓷艺人及民众对于美、艺术追求的思乡情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采用谐音、比喻、象征等表现手法，将器物、人物、动植物等形象以及吉祥文字语言，构成创作元素，表达出作铜瓷艺人或民众求福、求喜庆，求长寿、求吉利或消灾避难、趋利避害的思想观念。铜瓷艺人往往借助这样巧妙的元素组合构思，融入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特征。然而，审美不仅是创作者的追求、使用者的需求，作为铜瓷工艺品，它还存在许多有审美追求的欣赏者，如铜瓷收藏家，关于欣赏中的审美体现，凸显的也是个人的审美价值。

通过“修”而达到“复”的目的，“修”是工艺技术本身，而“复”的可以是外形观赏功能，也可以是复原使用的实用功能。修复以残缺、破损的器物为主，而这些不完整的器物在通过修复之后呈现出来一种“残缺美”。这种“残缺美”承载人们无穷的想象，也附着了人们的精神情怀。

山东铜瓷所属的艺术空间，无一不是在探索其美学魅力的体现。古有字画中以刻画铜瓷器物来追求仿古意蕴，字画中铜瓷器物的陈列位置，体现了作者画作中的构图美学。今有铜瓷艺人的工作空间或展览演绎空间，工作空间里的工具陈列、器物陈列以及相关环境氛围的陈列衬托，都体现铜瓷艺人的个人审美理念及追求，同时也反映出浓厚的个人艺术特色。而展览演绎空间，则是主题美学空间的体现，它是文化与艺术的碰撞。山东铜瓷作品所呈现出的美，是一种金属的力量美、铜瓷艺人精湛的技艺之美、设计理念的简约美、作品中文化与文化的碰撞美。

（四）商业价值

山东铜瓷最初作为营生生存，在本章前三节内容中也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旧时的市场需求大，服务的对象阶层不一，虽然铜瓷艺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当时并不高，但它自出现便存在经济效益，作为铜瓷艺人是具有收入的，这种经济往来也促使它成为了一门行当、一种职业。自古手工艺市场中流行一句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也足见手工艺的商业价值。将山东铜瓷的相关艺术资源进行转化，是它的应用功能得以体现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山东铜瓷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与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山东铜瓷可以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吸引消费者，开拓市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总体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山东铜瓷具备科学和技术价值，可通过制作出精美的作品，满足市场要求及需求，参与市场交换而获取相应的利润；具备艺术性和观赏性，可以通过展演、自媒体等形式开拓创收途径；借助国家文旅融合的相关政策，融入地方特色文化空间，或创设特色文化空间，与地方文旅活动相融合，助力地方文化特色的形成；作为传统技艺，它所带动的产业可以是瓷器收藏、古玩交流、考古修复等，对于推动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链条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开发利用都是要基于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探索符合现代市场需求的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模式。

结语

本文主要从山东铜瓷的生存语境和存在价值两个维度出发，阐述了山东铜瓷作为养家糊口的营生后的生存背景和生存语境。通过对山东铜瓷的历史存续的梳理，探析了山东铜瓷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通过对山东铜瓷的艺术特征的解读，可以看出山东铜瓷重视铜器的实用性，这与山东地区社会经济环境、人民群众勤俭朴素的生活观念关系密切。而山东铜瓷的传承与发展也反映了山东地区受孔孟思想的影响，思想较为保守，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开放性的思维也在逐渐深入至山东地区。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商业经济价值等方面阐述了山东铜瓷的存在价值。山东铜瓷之所以存续并发展着，它不仅仅是承担修复功能的技艺，它所体现的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承，是一种社会时代进步的记录，是人们生活追求的承载，是文化创新型转化，实现经济文化融汇发展的表达。

参考文献

-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70。
- 甘肃省博物馆，2006，《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录》，西安：三秦出版社，页247。
- 季中扬，2016，《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113。
- 刘鹏、宋充，2014，〈传统铜瓷手艺的存续与再生〉，《中国陶瓷》，页44-46。
- 鲁晓珂，2012，〈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页89-96。
- (美)保罗·康奈顿，2007，《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27。
-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遗产学研究中心，2004，《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手册》，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页161。
- 唐家路，2003，《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博士研究生论文，东南大学。
- 王巨山，2008，〈“物”与“非物”之辩——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物”的角色〉，《文化艺术研究期刊》，页95-101。
- 王文章，2006，《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页4-5、91、122。
- 夏鼐，1948，《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后收入《夏鼐文集》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页119-148。
- 谢明良，2019，《陶瓷修补术的文化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页59、67-68。
- 俞蕙、刘守柔，2017，〈传统修复技艺类“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研究〉，《遗产与保护研究》，页61-67。
- 张柏，2008，《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